

人口学与社会学

(苏) 乌尔拉尼斯

人口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如何, 判明这一点可说是当今的兴趣所在。但应该承认: 这一问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这样一种观点, 认为人口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如美国的社会学家威尔德·莫尔^①就持这一观点。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在各综合性大学中没有专门的人口学系, 而且专门的人口学教研室存在的也不多。但人口学的这种类似的境遇(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莫尔的故乡)并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正确。当然, 人口学同社会学的联系非常紧密, 但是, 人口学不可能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人口学应是知识中独立的, 同社会学、经济学及其它社会科学并存的一个分支。

首先, 我们要指出, 人口学有着自己轮廓明确的研究对象——人口(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即曾经和现正居住于确定的境域中的, 也就是居住在一定的地理和历史界限之内的人的总合。人口在数量、构成和分布方面都在不断变动, 而揭示这些变动的规律性也就是人口学的基本内容。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及在社会中所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学同样以揭示社会发展中的规律性为目的, 但它是把社会作为某种在地理和历史的界限内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来加以研究的。

不论在社会学中, 还是在人口学中, 基本单位都是人。但每门科学看待这一单位的角度各不相同。社会学家把人看作是个人、个性、看作是社会的一个成员, 并研究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在人口学家看来, 人就是一个居民, 就是一定的总合中的一分子, 在这一总合中他将失掉自己的各种特性。

人口学和社会学在实用方法上同样存在很大的区别。在人口学中统计方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人口——这是数量众多的人的总合, 所以, 这一总体所固有的全部规律性都要借助于大数规律, 即统计学基本原理才能揭示。社会学也同样采用统计方法, 但这些方法的采用范围要比人口学小得多。此外, 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决不会占有象在人口学中的那种可以说是特有的地位。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还广泛地采用个别情况的调查和访问等方法。

至于说到统计学, 应该指出, 那些在人口学和统计学之间划等号的作者是错误的。人口统计学仅是人口学的一部分, 它研究收集和整理有关人口资料的方法。当然, 统计方法的采用在人口学中起很大的作用。统计学在人口学中的重要作用决不意味着要把整个人口学简化为这种统计学。人口学是一门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 自己的研究方法, 理论和目的的科学。

因此应当指出, 人口学在计量方面被涉及的程度较之在社会学中要高得多。比如: 无论是人口学还是社会学都研究人口(社会)的阶级构成。在人口学中, 这一研究主要在于计算阶级构成对出生率、死亡率、及其它人口学内容的影响。没有大量的计量, 研究这些问题是不

^① 威·莫尔, 社会学与人口学, 载于《人口研究》, 芝加哥, 1959, 832—851。

可能的。社会学家则是将阶级构成当作一个社会范畴来看待，并在这一前提下，研究阶级的产生、阶级关系，搞清阶级差别，研究阶级的消亡等问题。因此，计量这一面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还可再举一例，我们讲战争——这件社会生活中的大事，社会学家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研究战争的性质等问题。而人口学家同样也研究战争，但目的是确定战争损失的程
度，研究战争的后果和测定战争对各种人口过程的影响。从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在分析社会现象上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界线是相当分明的。

还应从有关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方面来说明人口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人口过程同生物学的联系较之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并为社会学所研究的那些过程同生物学的联系要紧密得多。要知道一个人的出生或死亡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事实，而且还是一种生物现象。

讲到这里时指出以下的问题是适宜的，即某些资产阶级人口学家认为，似乎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依据的人口学否认各种生物原因的作用，将一切人口学研究内容都简化为只是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概念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人口学家把基本的人口学内容——出生率和死亡率看作是社会的和生物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人口学家在评定那些否认生物方面因素作用的著作时，总把它们看作是庸俗社会学概念的反映，这些概念的主要特点恰恰是忽略了人不仅是社会的成员，而且也是“自然界一分子”这一点。

出生或死亡的每一种情况都有一定的生物起源和一定的生物原因，但是所有这些情况的总和又在总体上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制约性。当我们从出生状况转到出生率，从死亡状况转到死亡率的时候，也就是从生物学转到了人口学。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说，比如，出生率乃是一方面具有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生物基础的一种现象。

在谈到各种因素时，应特别强调指出意志因素的作用在社会学中要比在人口学中具有更大得多的意义。在某些社会学派中，研究人的行为是整个学科的奠基石，而在人口学中，研究人的行为只起有限的作用。例如：只有在自杀的情况下，才能看到死亡率同意志因素的联系。出生率对人的行为的依赖性也只不过稍大一些。人离开生育的自发性越远，父母的自觉性越强，则研究人口学的行为就变得越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人口学与社会学的接触点也最多。

综上所述，社会学和人口学共居于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它们彼此充实，互相丰富在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取得研究社会和人口发展规律的成果。

在提到人口学和社会学这一“双边联盟”的同时，还需要指出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一“三方联盟”所富有的成果性和合理性。对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且某一种方法，比如说是从社会学角度制订的方法就不同于其他的从经济学或人口学角度所制订的方法。这些方法甚至可以表现为互相对立。但特别重要的是一定不要使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这个“三角”变成一座迷宫，因为从这样的迷宫中是找不出一条通向将能改进对社会进程进行科学管理的具体建议的康庄大道的。我们想举出一些实证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例如，可以举出都市化问题。在苏联，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但是，各个城市之间的规模显著不同。人口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各个城市的分布取决于新建企业的这样或那样的

分布。究竟是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才合理呢，是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最经济的是发展小城市或中等城市，而不是大城市。在大城市中，大量的开销用于运输，公共设施及各种社会服务部门等。但是，社会学家的观点却认为，对于居民来讲，大城市较之中、小城市更要美好得多。人们向往“大城市之光”。具体讲就是在大城市中，有更多的可能为自己找到最有成功希望的职业，大城市的居民有最多的选择职业和学业的条件，有较好的条件来提高文明修养和各种消遣等。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究竟应当偏重于哪一种城市建设方案？为此，应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解决城市大小问题的方法之外再补充第三个，即人口学的方法。应该注意到在不同规模城市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样，城市规模对于城市人口的健康的影响等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这方面，人口学家的意见应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人的生命是不能用任何“经济核算”方法来计量的珍品。当然，不管怎样，我们只有在这三种方法的相互联系中去利用它们，才能导致更接近于对社会规划问题的最优解决。

我们再举一例，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妇女养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那么她就没有精力参加社会生产了。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平均为一个孩子所付出的工资已算超过了额定的单位。所以，暂时使有三个幼儿的妇女做家庭主妇在经济上是合适的。但社会学的观点却适得其反。因为这时它所涉及的已不是“有利”或“无利”的问题，而是妇女养育儿童会在多大程度上使她脱离生产，以及家庭的狭隘环境将会限制她的活动范围的问题。

同上述情况一样，应为这两种观点再补充第三个——人口学的观点。人口学应指出妇女劳动对出生率水平的影响，并查明部分妇女转入家务会有怎样的后果。结合这三种观点，用比较和对照的方法分析每一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使我们找到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我们再举一个生产方面的例子。就某些工业部门实行三班制是否合理的问题曾展开了许多争论。经济学观点是为三班制辩解的，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设备，尽快地消耗旧设备，以使用技术上更先进的设备来更新它。而社会学则反对三班制。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制度对于工人（指个人意义上的工人）的各种利益是不适宜的，并且会涣散工人对自己劳动活动的态度。三班制常常与生活习惯的某些不便相联系，与家庭等利益相违背。那么，人口学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它是否回避解决这一问题呢？当然不是。夜班制度能够引起损伤病率的提高，破坏正常的睡眠，因此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寿命。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人口学与社会学是一致的。除了由于连续生产过程（高炉生产、化学工业等）的工艺制约而须要实行三班制外，应该赞成废除三班制的决定。

正如我们所感到的一样，从援引的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人口学、社会学及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很难说，这三者中哪一门科学能充任“最高判决”的仲裁者角色。这三门科学只有在相互补充和充分地“彼此谅解”的条件下，才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将成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科学地掌握社会进程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对社会进程的这种科学的掌握才能够保证最充分地满足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各种需求。

（摘译自乌拉尼斯著：《人口研究与评论》，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76年版。李通生译，元群校）